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中的第三方因素

——以美国和印度的政策为例*

包澄章**

摘要: 随着中国在阿拉伯地区利益的拓展,中阿关系发展和中阿合作日益受到第三方因素影响,影响方式包括干扰或阻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制约或损害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利益,遏制或打压中国在地区的行为。本文以美国和印度两大域外第三方因素为考察对象,分析美国和印度的政策对中阿关系及中阿合作的负面影响。第三方因素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叠加效应、突变效应和抵消效应,也可能催化或加速中阿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降低双方战略互信、削弱双方合作意愿,并可能引发合作进程逆转、合作终止等一系列后果。

关键词: 中阿合作 美国 印度 第三方因素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实现了从“新型伙伴关系”到“战略合作关系”再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提质升级。阿拉伯地区

*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整体外交研究”(19AGJ010)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 2019 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19PJC088)的资助。

** 包澄章,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中东国际关系、中阿关系、国际恐怖主义等。



正处于恢复稳定、推进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实践大国外交和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未来世界格局重塑和国际体系转型可以倚重的政治力量。中阿关系的整体提升，为中国在阿拉伯地区深入拓展利益提供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利益不可避免会与域内外各方力量的利益发生碰撞甚至产生冲突。第三方因素的卷入以及第三方因素相互之间的互动，会催化或加速利益冲突的发生过程，导致合作双方降低战略互信、增加战略疑虑，削弱双方合作的意愿和效果，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双方从合作走向冲突。

第三方因素一般是指存在于双边关系范畴之外，对双边关系及合作发挥负面影响的外部力量、议题或因素。其影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干扰或阻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制约或损害中国在阿拉伯地区利益的实现、遏制或打压中国在地区的行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既包括多边层面尤其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集体合作，也包括双边层面基于具体协议和机制开展的合作。虽然阿拉伯地区内部具有多样性和碎片化特征，且一般难以将该地区作为统一的整体予以考察，但第三方因素对次区域和区域层面中阿关系与中阿合作的负面作用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本文主要关注第三方因素对中阿集体合作的整体影响。

美国是对中东事务具有长期支配性影响的域外大国，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不仅对地区格局与秩序、地区国家政策和行为等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外部国家与地区国家间的合作产生影响。中美关系是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会间接推动或影响其他地区的格局走向。印度是中国的邻国，也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东地区的域外国家之一。中印同为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中东能源的巨大需求，使其与阿拉伯产油国的合作呈现出一定的同质性。本文以美国和印度两大域外第三方力量作为考察对象，分析美国和印度的政策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及中阿合作的负面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第三方因素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效应及其表现。



一 特朗普时期“美国因素”对中阿合作的影响

特朗普自2017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凭借其个人化的行事风格和“美国第一”的外交原则，对美国中东政策进行了调整，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动中东联盟体系以服务自身利益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惯用手段。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巩固地区联盟体系和提高盟国军事实力的同时，奉行“美国第一”的外交原则，不断利用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寻求利益空间，服务美国在地区的利益。美国通过军事支持沙特和巩固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不断压缩伊朗在地区的生存空间，这不仅导致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博弈进一步加剧，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美国的地区盟友——以色列与沙特之间的互动不断加强。美国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引发地区盟友土耳其强烈不满，使土耳其不断向伊朗与俄罗斯阵营靠拢。俄罗斯利用日内瓦和谈、阿斯塔纳和谈、索契和谈等机制，不断提升对叙利亚问题的话语权，借助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的三角关系，加大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特朗普政府巩固中东联盟体系的努力，虽在短期内取得收益，却催化了地区力量的阵营化对抗，导致中东地区格局持续失衡，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和美伊关系恶化，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信誉度遭遇滑坡。美国地区盟友对美国全面遏制伊朗政策的态度不一，除以色列和沙特全力支持外，土耳其、埃及、约旦、阿曼和卡塔尔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均持保留态度。

第二，美伊对峙升级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进一步恶化了原本脆弱的地区安全环境。特朗普上台后，通过退出伊核问题协议、将伊朗列为“支恐”国家、对伊朗实施和追加制裁、打压伊朗地区盟友等手段，全盘否定奥巴马政府在伊核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和外交遗产。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新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和《2019财年美国国防部预算概况》三份文件，分别从指导原则、军事战略、资源投入等方面，进一步确立了美国对伊朗的新战略，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则标志着这一战略的正式成型。^① 退出伊核协议延续了特朗普上台以来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政策基调。在遏制伊朗方面，美国主要运用经济杠杆和金融霸权等手段打压伊朗的能源、石化、金融等关键经济部门，同时调动美国的地区联盟体系来扭转伊朗因地区扩张而取得的战略优势，依靠美国的军事实力增加对伊朗的威慑，全方位遏制伊朗的地区生存空间。其中，经济制裁是核心手段，军事威慑、宣传战、秘密行动是辅助手段，外交谈判分量最轻。^②

对伊朗动武并非美国实施“极限施压”的初衷，特朗普政府的目的是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与美国签订一份比2015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更好的核协议”。此前伊朗则通过分阶段中止履行伊核协议、制造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依靠代理人对美国及其盟友进行袭扰等方式，对美国的“极限施压”予以“极限抵抗”。随着美伊对抗的升级，伊朗官方的态度从克制转向强硬，战略耐心逐渐耗尽，宣布对美国“永久关闭外交渠道”。进入2020年以来，美伊在对峙过程中各自突破了对方的“红线”。2020年1月3日，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以极端手段击杀在整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伊朗军事将领；伊朗则依据其宣称的“对等报复”原则，公开袭击美国在地区的军事机构。美伊之间的对抗形式，则从此前依靠代理人袭扰对方机构和人员，扩大为直接的军事对抗。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使原本脆弱的中东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第三，以收缩军事力量、运用经济杠杆、漠视国际准则为主要特征的“特朗普主义”，本质上是奥巴马政府“离岸平衡”政策的延续。奥巴马政府基于美国利益优先顺序的判断，将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重点，这反过来表明奥巴马政府对“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和解决叙利亚问题不寄予任何希望。^③ 然而，特朗普政府“美国第

① 王雷：《透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新战略》，《当代世界》2018年第9期，第46页。

② 王雷：《透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新战略》，《当代世界》2018年第9期，第46页。

③ Marc Lynch, “Belligerent Minimalis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9, No. 4, p. 130.



一”的政策取向，在实践过程中表现为依靠地区盟友在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方面增加投入和承担责任，其本质上仍是奥巴马政府“离岸平衡”政策的延续，同时也是近年来美国对中东事务主导能力下降的表现。“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旨在化解可能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的状况，并以进攻性的经济政策取而代之，同时无视最广泛意义上其他国家意见的政策”。^①

“特朗普主义”的政策取向具体表现为：降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风险，在维护中东安全和反恐方面进一步收缩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力量；注重运用经济杠杆强化美国与地区盟友的经济联系，打压地区反美政权或敲打与美国意见不合的地区国家；在涉及地区政治和安全重大问题的政策制定上，漠视国际准则、全球舆论、外国政府的意见以及美国国内建制派的批评。

“特朗普主义”并不是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时常承诺的孤立主义或在具体实践中体现的“好战”思想，而是一套强调脱钩（disentanglement）、收缩（retrenchment）和再结盟（realignment）的思想，是美国放弃过于理想主义的希望和不切实际的军事承诺、缩小潜在敌人的名单、巩固自身影响力的尝试。“特朗普主义”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像特朗普的对手经常指责的那样“放弃美国的主导地位或放弃美国的盟友”；相反，它是为了维持美国在更易于管理的基础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将更多的精力和努力放到遏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上。^②因此，美国是在确保其对中东事务主导权的基础上，将更多战略资源投入全球层面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和打压行动中。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各领域合作需要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调整导致的地区安全环境恶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凸显了作为第三方因素的美国对中阿关系发展和中阿合作的负面影响。

首先，中阿伙伴关系网受到美国地区联盟体系的冲击。中国的中东政策

① George Friedman, “The Trump Doctrine”, *Geopolitical Futures*, July 11, 2018, <https://geopoliticalfutures.com/the-trump-doctrine/>, 登录时间: 2019年12月9日。

② Ross Douthat, “The Trump Doctrin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1/29/opinion/trump-doctrine-venezuela-afghanistan.html>, 登录时间: 2020年1月5日。



主张不结盟、不干涉内政、不选边站的外交原则，奉行“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①的政策基调。在双边层面上，中国已先后同阿尔及利亚（2014年2月）、埃及（2014年12月）、沙特阿拉伯（2016年1月）和阿联酋（2018年7月）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卡塔尔（2014年11月）、苏丹（2015年9月）、约旦（2015年9月）、伊拉克（2015年12月）、摩洛哥（2016年5月）、吉布提（2017年11月）、阿曼（2018年5月）和科威特（2018年7月）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多边层面上，中国于2018年7月同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中阿伙伴关系网是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双方在核心利益、发展战略、民族复兴方面凝聚共识和增强互信，在观念和行动层面保持一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在阿拉伯地区建立的伙伴关系网客观上对美国借助地区联盟体系实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形成了一种“软制衡”，是推动形成地区多极格局、“稀释”联盟体系的外交实践，有助于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在战略上同其他大国形成不对称的依附关系。^②

在特朗普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基于伙伴关系网开展的合作，不仅易受到美国地区联盟体系的干扰和阻挠，中国自身也面临被动卷入地区冲突和阵营化对抗的风险。美国在施压阿拉伯盟友和限制其与中国合作的同时，还与西方盟友共同制造和散布“中国威胁论”“秩序颠覆论”“地缘扩张论”“规则破坏论”“债务陷阱论”“经济掠夺论”等，企图将“一带一路”倡议政治化。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对地区联盟体系的利用和调动，旨在借助美国的地区联盟体系冲击甚至瓦解中国在地区构建伙伴关系网，以此限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

其次，美国在舆论层面挑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带一路”沿

①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2016年1月21日，开罗），《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第3版。

② 孙德刚：《论21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128页。



线的伊斯兰国家集中分布在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非地区。中东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美国与 11 个中东国家结成同盟，除以色列和土耳其外，其余 9 个都是阿拉伯国家，即埃及、伊拉克、约旦、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以阿拉伯国家为核心的伊斯兰国家，是中国以“一带一路”推进未来世界格局重塑和国际体系转型可以倚重的政治力量。

进入 2018 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涉疆问题的话语塑造，尤其将新疆问题塑造成中国整体打压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人权的问题，正在影响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在阿拉伯地区的推进。近年来，阿拉伯国家的反华舆论正在日益形成气候，对中国涉疆、涉伊斯兰议题的关注度和炒作频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不乏美国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因素。这令中国在涉疆问题上面临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复杂。受此舆论影响，近年来，中东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对中国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其注重利用中国国内涉伊斯兰事件和热点问题进行炒作，鼓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多次对中国发出威胁，凸显了涉疆问题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正对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合作构成潜在风险。

最后，美国反恐政策引发的地区动荡，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在阿拉伯地区的推进。特朗普上台后，将反恐、遏制伊朗和巩固传统联盟体系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在国际反恐力量的合力打击下，“伊斯兰国”实体的溃败使反恐取得阶段性胜利，为美国从中东反恐战场脱身奠定了基础。进入 2019 年以来，美国不断释放从叙利亚、阿富汗撤军的信号，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尤其是中东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均强调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将反恐领域的战略资源转移至遏制中国、俄罗斯等美国所谓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上，这已成为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战略共识。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面临地区反恐形势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现实挑战。一是恐怖活动手段更加多元，除之前惯用的简易爆炸装置、绑架、勒索等手段外，近年来中东恐怖组织对无人机、化学武器的使用频率正在上



升。二是恐怖融资出现新趋势，如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正转向使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来规避监测，这虽然在短期内无法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一动向代表了恐怖主义势力对新技术的运用。三是叙利亚当地关押恐怖分子的监狱或已达到极限。如叙利亚东部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的一座监狱关押着超过5000名“伊斯兰国”成员，其中大部分为外籍人员。四是中东地区仍存在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土壤，地区国家既缺乏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而地区普遍存在的“以对抗求安全”思维定式以及对外部力量的安全依赖，进一步加大了地区国家形成安全共识的困难。五是地区反恐常沦为域内外力量用以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反恐阵营化、反恐目标与手段的错位、不同反恐标准的差异乃至反恐双重标准等，成为地区反恐治标不治本的主要原因。中阿在开展具体合作过程中，无论是中国驻当地机构、企业和人员，还是大型基建项目、海外产业园区，都面临这类安全风险及挑战。

二 莫迪时期“印度因素”对中阿合作的影响

印度在地理和文化上比中国更接近阿拉伯地区，这为印度参与阿拉伯地区事务提供了天然条件。2019年5月莫迪连任后，中印关系表现出较之以往更为复杂的一面，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同时崛起的大国，在全球事务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在地区事务中时而友好和互动，时而猜忌和摩擦。^①印度作为第三方因素，对中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中国争夺阿拉伯能源市场和能源运输通道。尽管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同为发展中大国和能源进口大国的中国和印度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使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与两

^① 曾向红、陈明霞：《追求“领导性大国”：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5期，第45页。

国在能源、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能源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中国和印度发展与阿拉伯产油国贸易最主要的驱动力。中国和印度对中东的原油依存度分别达 50.7% 和 58.3%。2019 年，中印分列全球第一大和第三大原油进口国，两国原油进口量的全球占比分别为 22.6% 和 9.7%，自 2015 年以来增幅分别达 77.7% 和 41.4%。^① 在辛格时期，能源安全在印度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已仅次于粮食安全。^② 2015 年印度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和印度对能源进口的巨大需求，使两国对中东能源市场呈现出一定的竞争态势。

印度的地理位置优势，为其拓展与海湾国家的能源贸易提供了天然便利。从能源战略通道建设的角度看，在海上，印度西海岸与能源资源蕴藏量丰富的海湾地区隔海相望；在陆上，印度与中东地区地理位置接近，尤其是与中东地区的化石能源蕴藏和生产大国伊朗之间的地缘位置更为接近，这为印度和海湾产油国开发与建设海陆能源战略通道提供了现实基础。^③

对中国而言，印度洋海域充当着中国能源运输通道和经济贸易走廊的角色，连通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等战略通道。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印在能源领域的博弈不仅是对海湾能源供应的竞争，也是围绕印度洋能源运输通道及相连海域战略通道的竞争。

第二，与中国竞争海湾劳动力市场。印度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外籍人口的第一大来源国，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印度籍劳工数量超过 850 万人。该群体是印度与海合会国家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印度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2018 年印度籍劳工在海合会成员国的分布情况分别为阿联酋（310 万人）、

① Zhang Zhijie and Xing Wanli, "Overseas Oi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ased on Crude Oil Trade Flow Analysis", p. 3; Daniel Workman, "Crude Oil Imports by Country", *World's Top Exports*, April 23, 2020,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crude-oil-imports-by-country/>, 登录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

② 刘红涛、张梦露：《印度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及前景》，《学术探索》2017 年第 12 期，第 55 页。

③ 刘红涛、张梦露：《印度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及前景》，《学术探索》2017 年第 12 期，第 56 页。



沙特（218.2万人）、卡塔尔（69.25万人）、阿曼（68.8万人）、科威特（92.8万人）和巴林（31.3万人）。^① 相比之下，在海湾地区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数量远低于印度人，即使在中国籍劳工和侨民数量最多、外籍人口占总人口88.5%的阿联酋，也只有区区近30万中国人。^②

受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低迷、国内失业人口高企、财政收入锐减等因素的影响，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快了经济改革和国家转型的步伐。沙特实行的“沙特化”就业政策，一定程度导致外籍劳工在沙特就业机会的减少，而政府上调增值税率和收紧工作许可证等举措，进一步增加了外籍劳工在沙特的生活成本。印度籍劳工主要从事能源、建筑、医疗护理、工业维修等领域的工作，而印度海外劳动基数大、海湾国家本国化就业政策、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使中国在海湾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既要面对本国海外劳动力不具备明显优势的现实，也面临当地劳动力市场来自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外籍劳工日益激烈的竞争。

第三，与中国开展软实力竞争。中国近年来通过教育合作、学术研讨、图书出版、媒体传播和民间交流等方式，向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阿拉伯地区投射软实力，努力塑造“和平崛起的文明大国”形象。由于缺乏基于海外侨民、劳工的跨国文化传播网络，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软实力传播面临文化传播意识不足、文化产品供给有限、文化传播精准度不高等现实障碍。

对印度而言，海合会国家的印度籍劳工成为印度拓展在海湾地区拓展软实力的重要依托对象。印度定期在阿盟成员国举办“印度文化节”，以及在印度举行的“年度文化遗产节”，成为阿拉伯-印度合作论坛执行计划的重

① 参见“Population of Overseas Indians (Compiled in December, 2018)”,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pp. 3-6, https://mea.gov.in/Images/amb1/ru2885_anxx121.pdf, 登录时间: 2020年2月7日。

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阿联酋(2019年版)》,第8页, <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alianqiu.pdf>, 登录时间: 2020年1月7日。

要内容。^① 印度总理莫迪的“瑜伽外交”以及宝莱坞电影，已成为印度在海湾地区乃至整个阿拉伯地区提升和传播软实力的重要文化产品。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在海湾地区家喻户晓的宝莱坞影星萨尔曼·汗（Salman Khan）与阿布扎比公共卫生中心联手向当地民众推广防疫知识，号召民众实行居家隔离并“像英雄一样做正确的事”，^② 这正是得益于宝莱坞电影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广泛影响力。历史上的“百年翻译运动”曾使印度大量的天文学、数学和文学作品被译成阿拉伯语并在整个地区广泛传播，基于历史交往的文化纽带，成为印度在阿拉伯地区拓展软实力的天然优势。

第四，制衡中国在西亚地区的利益。莫迪上台后，印度政府将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Act East）政策，不久又提出针对中东地区的“西向谋划”（Think West）政策，这一凸显印度地缘政治定位的新政策体现出新时期印度外交的泛亚洲特色，试图在实现印度洋与太平洋联动的过程中，确立印度的全球大国地位。2014年，莫迪政府以20世纪印度商人利用印度洋季风出海阿拉伯地区和印度与环印度洋各国在海上贸易、宗教活动、文化交流领域的互动为由，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季风计划：海上航路与文化景观”的世界遗产项目，但遭到中国方面的反对。在外界看来，莫迪政府有意将“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与“印度制造”“萨迦尔玛拉”（香料之路）等计划整合成战略规划，提升印度的地缘政治影响力。^③ 印度学术界认为，将“季风计划”提升到战略高度，是莫迪政府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制措施，这使“季风计划”和“一带

① “India-Arab Relation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July 2013, p. 2, https://www.mea.gov.in/Portal/ForeignRelation/India-Aarb_Relations.pdf, 登录时间：2020年1月12日。

② Manjusha Radhakrishnan, “WATCH: Bollywood’s Salman Khan Urges Abu Dhabi Residents to Stay Home and Tackle COVID - 19”, *Gulf News*, May 18, 2020, <https://gulfnnews.com/entertainment/bollywood/watch-bollywoods-salman-khan-urges-abu-dhabi-residents-to-stay-home-and-tackle-covid-19-1.71550555>, 登录时间：2020年5月20日。

③ 周良臣、谷棣：《印度季风计划申遗遭反对或系反制“一带一路”》，《环球时报》2017年1月10日。



一路”呈现竞争态势。^①

印度实施印太外交的过程中，“制华”色彩日益浓厚，不断冲淡东进战略中的对话合作面。印度方面还强调以“西向谋划”的西进战略配合“东向行动”的东进战略，^②如莫迪上台后即调整了印度的中东政策，注重发展与阿联酋、沙特、伊朗和以色列等地区支点国家的关系。未来中国在西亚地区的利益或受到印度西进战略的制衡和冲击。

三 “第三方因素”互动效应对中阿合作的影响

“第三方因素”对中阿关系发展和中阿合作不同程度地产生制约、阻碍或干扰。这一过程既可以表现为第三方因素单独发挥作用以影响中阿关系的发展，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第三方因素通过相互作用对中阿关系施加影响。第三方因素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效应主要包括叠加效应、突变效应和抵消效应。

首先，叠加效应。第三方因素的相互叠加，可能会加重中阿在关键领域合作的难度。例如，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美国的中东盟友配合美国遏制伊朗、伊朗经济压力加重导致国内爆发民众抗议浪潮等因素的叠加，迫使伊朗选择了扣押霍尔木兹海域外国油轮，或策动地区代理人袭击沙特国内的石油设施予以回应。中国在中东地区关键石油运输航道的畅通极易受到此类第三方因素叠加效应的负面影响。又如，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配以针对“一带一路”特定领域污名化的操作，可能会改变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误解、形成负面认知至战略误判。对特定领域的污名化一旦出现向其他领域扩散的趋势，中国在次区域层面、区域层面乃至国际层面上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

其次，突变效应。政权更迭、政府换届、突发事件升级，可能引发的第

^① 参见陈菲《“一带一路”与印度“季风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国际展望》2015年第4期，第15~32页。

^② 参见李莉《印度东进战略与印太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第37~45页。

三方力量大幅调整中东政策或对华态度，进而影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及合作。但第三方因素发生突变，或向中阿合作注入不确定性。例如，特朗普政府在全盘否定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遗产的过程中，采取了退出伊核问题协议、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将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等一系列措施，凸显了特朗普本人作为美国中东政策中具有突变性特征的变量之于地区整体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引发的油价波动、地区力量行为改变以及地区国家政权安全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应激性反应，都会增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而使中国在当地企业、机构、人员的利益受到因第三方因素突变而产生的连带性影响。

最后，抵消效应。第三方因素可能因相互之间存在立场冲突而相互掣肘，可以部分抵消其对中阿合作产生的负面效应，缓解中阿合作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例如，恐怖主义、美国的反恐政策和伊朗的反恐政策是互相矛盾的三个因素。美国奉行“反恐”与“用恐”并重的策略，特朗普政府还将伊朗定为“支恐国家”；伊朗则注重借助地区反恐行动扶植地区亲伊朗的民兵势力；而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地区恐怖主义势力，将美国和伊朗均作为其攻击对象。恐怖主义是引发地区动荡的重要因素，美国和伊朗的反恐政策虽不必然导致地区动荡，但各自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配套政策和连带行为，为地区安全注入了不稳定因素。但三种因素之间的相互掣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作为单独的第三方因素对中阿合作的负面作用。尽管美伊各自反恐的对象存在差异，但2018年以来“伊斯兰国”实体加速溃败的现实，客观上降低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安全成本。

第三方因素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叠加效应、突变效应和抵消效应，可能催化或加速中阿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降低双方战略互信，削弱双方合作意愿，并可能引发合作进程逆转、合作过程终止等一系列后果。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中阿双方在夯实政治互信的同时，需要管控好第三方因素主动或被动卷入合作进程，排除各类干扰合作意愿、阻碍合作进程、损害合作利益的负面因素，推动中国在阿拉伯地区构建覆盖面更广的伙伴关系网。



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多个阿拉伯国家也都启动了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改革计划。保持政策沟通渠道的畅通是确保中阿合作政策延续性的关键。在这方面，中方需要注重政策沟通的平衡性和平等性，避免政策沟通出现“单向灌输”，深化对阿拉伯国家现实需求的了解；拓展政策沟通领域和渠道，尤其要加强中国民营企业同当地企业的政策沟通；切实回应阿拉伯国家的重大关切，摆脱过去重经济、轻安全的政策沟通导向；加强公共外交，借助媒体、智库、政要等机构深化阿拉伯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努力“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严禁非法下载、传播、复制、翻印、扫描、复印、打印、转载、摘编、引用、汇编、发行、出租、出借、转让、许可、再许可、出租、出借、转让、许可、再许可。

①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2016年1月21日，开罗），《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第3版。